

Practicing “Tibetan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Refugee Economy of Exiled Tibetans in India and Nepal

Mei-Lin PAN

在市場中實踐「西藏意識」：
印度、尼泊爾流亡藏人的難民經濟

潘美玲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NSC100-2410-H-009-031-; NSC101-2410-H-009-021-MY2; MOST(NSC) 104-2420-H-009-002-2R)的部分成果。本文初稿曾於2017年11月26日在「臺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社流感(Socioflu-enza): 集體行動新視界」宣讀, 評論人林平教授及與會人士的指正, 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 在此一併致謝。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電子信箱: mlpan@mail.nctu.edu.tw

摘要

在全球化的跨國移工或經濟移民的現象中，本文探討的是非自願移民的難民群體的生存策略與經濟運作機制。主要針對流亡藏人社群，因為其難民的狀態，同時擔負著維繫西藏的文化使命，而發展出來的「西藏意識」(Tibetanness)，從政治認同的面向拓展到市場上的經濟實踐，從而影響其生存策略與經濟活動的實踐。透過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業，以及在尼泊爾發展的西藏地毯產業，以多點民族誌與比較分析策略，檢視流亡藏人如何在這兩個產業市場當中實踐其「西藏意識」，從而構成西藏難民的經濟特色。這種西藏特色有助於市場差異化策略的進行，但也構成了產業發展的限制。印證了博蘭尼所指出市場鑲嵌在社會之中的運作，尤其流亡藏人社會的發展要務，在於為西藏的家園尋求正義，並以維持認同與文化傳統為優先，因此經濟的目的在於維生，是完成西藏志業的工具，從而對於資本主義式的財富積累和壟斷式的擴張，產生了節制的力量，維繫了藏人在流亡處境下族群團結的基礎。

關鍵詞：流亡藏人、難民經濟、西藏意識、西藏志業、宗教倫理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exiled Tibetans as involuntary migrants, and their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mechanism. Exiled Tibetans developed “Tibetanness” because they are refugees with responsibility to preserve Tibetan culture and tradition. “Tibetanness” has been derived from political identity, shaping exiled Tibetan’s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practice. Winter sweater-selling business in India and Tibetan carpet industry in Nepal are two cases to demonstrate how exiled Tibetans exercise their “Tibetanness” in the refugee economy. To make a living is the major purpose of refugee economy and it also serves the Tibetan cause: to seek justice for Tibetans and to preserve identity and languag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on exiled Tibetans in India and Nepal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of “Tibetanness.” The result has confirmed Karl Polany’s theory that market is embedded in society. Exiled Tibetans have found their way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ic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competition, and to re-enforce their national solidarity.

Keywords: Exiled Tibetan, Refugee economy, “Tibetanness”, Tibetan cause, Religious ethics

一、流亡作為一種生存處境

2017年6月20日國際難民日前夕，聯合國難民總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全球趨勢》(*Global Trends*)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球被迫流離失所的人數達歷史新高，共有6,560萬人，其中跨越國界避難的「難民」(refugees)，根據聯合國難民總署《一九五一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第一條的定義，「凡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其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見解或屬於某一特殊社會團體而遭到迫害，因而逃離他或她的本國，並且由於此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回國的人」¹，人數達2,250萬人，是聯合國難民總署於1950年成立以來統計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高紀錄(UNHCR 2017)。不幸的是，難民的人數繼續成長，2017年的被迫流離人數繼續攀高到6,850萬人，難民人數達到2,540萬人，刷新前一年的紀錄(UNHCR 2018)。

上述資料呈現近年來難民的持續大量湧現，如何安置流離失所者成了國際社會無法忽視與迴避的議題。來自各地的難民，其產生各有歷史背景與政治脈絡，然而對於每一個逃離國境的男女老少，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中，其難民的身分都是失去國家保護的人，在現有以民族國家構成之國際體系中，是無法被歸類到任何既有秩序當中的，呈現「中界」、「闕界」(liminal)的身分(Malkki 1994)。這些無法被歸類者經常成為當代社會秩序體系下的被排除者，他們的存在本身，事實上也構成一種社會類別。這些難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家園，在逃難的過程中，通常能夠攜帶的家當非常有限。與具有經濟動機的移民或追求經濟機會的移工相比，難民是非自願型的移民，維生處境更需要依賴收容地主國的協助。因此，如何到另一個國家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難民的特質以及生存處境的因應，是本文關切的主題。

1 原文：“A person who is outside his or her country of nationality or habitual residence; has a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because of his or her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and i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avail himself or her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or to return there, for fear of persecution.” (UNHCR 2010: 15)

在1959年約有13,000名西藏人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其後一兩年間，約六萬多名西藏人不願留在中共統治下的祖國故鄉，陸陸續續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等西藏鄰國，尋求政治庇護。1960年達賴喇嘛接受當時印度政府提供的北印度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為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in Exile)²所在地後，為了妥善處理流亡藏人的安置問題，達賴喇嘛向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提出了幫助藏人在印度建立定居區的要求，防止藏人流散印度各地，以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傳統，維持藏人的認同與政治社會凝聚力。於是在尼赫魯總理的協助下，第一個藏人定居區在南印度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比拉庫佩(Bylakuppe)建立，之後共成立58個正式的流亡藏人定居區：39個集中在印度、12個在尼泊爾，7個在不丹。根據西藏流亡政府在2009年四月中旬所完成的流亡藏人人口統計調查，流亡藏人的人數已達127,935人之多。其中印度有94,203人，尼泊爾13,514人，不丹1,298人，在世界其他國家定居者共有18,920人(Office of Planning Commission 2010: 13-15)。

藏人的流亡有幾個特色：(1)若與當前頻繁的經濟移民和勞動力流動等自願性跨國移動的現象進行對照，他們是被迫逃離家園且後無退路的非自願性跨界流動；(2)雖然是難民，他們並沒有被拘束在難民營，其生存處境也不只是仰賴國際的救援；相反的，在流亡印度60年當中，他們建立起一個自給自足的流亡經濟典範(Mahmoudi 1992; Bernstorff and Welck 2004)；(3)在當前中國統治西藏實施宗教控制以及日漸漢化的情勢下，如何維繫西藏傳統宗教文化的命脈，是流亡社會的重要使命，因而流亡藏人產生了一種具有流離意識的西藏特質——「西藏意識」(Tibetanness)。

對於這種「西藏意識」的研究，在當代流亡社群的學術文獻當中，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這些學者研究關注的面向是流亡藏人的認同議題，強調西藏國族主義的建構，特別是離開了西藏家園成為難民之後，流亡社會透過哪些方式與論述，形塑出流亡社群的集體認同。對於流亡之後的第

2 又稱Central Tibet Administration(CTA)，兩者可互用(Tibet Justice Center 2011: 8)。

二代，只能憑著父母親與族人的記憶想像西藏的家園，如何維繫西藏認同的使命，也是這些文獻討論的重點(Anand 2000; Houston and Wright 2003; Misra 2003; Gilesa and Dorjee 2005; Falcone and Wangchuk 2008)。整體而言，這些研究文獻對於「西藏意識」的內容與運作機制的討論，聚焦在流亡政府與流亡人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在國際間能夠引起世人對流亡藏人處境的同情，進而形成能夠予以支持的論述與行動。

然而，這種意識並非只存在國族主義的認同情境之下，也不是只有在政治活動中才被強調，因為難民的身分與標籤，以及保留西藏傳統文化的使命感，對於流亡社會的經濟活動也會產生影響。藏人有意識地在市場中實踐「西藏意識」甚至成為流亡藏人的難民經濟特色。西藏流亡政府對於流亡社會經濟所制訂的發展方針，就開宗明義地聲明流亡的目的是「為西藏的家園尋求正義，並以實踐文化和傳統來保存認同與語言」³，因此，即使在經濟的領域也要以「西藏意識」的實踐，而非財富的積累為優先。這種實踐並非在傳統的農業部門，而是在當代社會的市場經濟中運作。因此，本文主要針對流亡藏人社群，因其難民狀態，同時擔負著維繫西藏的文化使命，而發展出來的「西藏意識」，如何影響其生存策略與經濟活動的實踐。透過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以及在尼泊爾發展的西藏地毯產業，檢視流亡藏人如何在這兩個產業市場當中實踐「西藏意識」，從而形成西藏難民經濟的特色。此外，這種西藏特色如何有助於市場差異化策略的進行，又在哪些面向成為產業發展的限制，也是本文希望回答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跨國移工或經濟移民的現象中，本文探討的對象是較少被觸及的非自願移民的難民群體，及其生存策略與經濟運作機制。接續博蘭尼(Karl Polanyi, 1886-1964)所主張的市場鑲嵌在社會之中的觀點，經濟社會學關注的是經濟生活如何受到社會文化，及其被鑲嵌其中之脈絡的影響，

3 根據流亡政府所制訂的2003到2006年「投資與施行準則」(Investment &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流亡社會發展的優先性為：“The purpose of the Tibetans in exile is two-fold, viz., to seek justice for our homeland and, to preserve our identity and language by practicing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s.”(CTA 2003)。

並對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原則提出反思。經濟社會學者直接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提出的「經濟人」以及個人主義利益極大化等預設，加以批判，強調人類的經濟行為，也來自於各種非經濟性的動機，包括社會的義務與規範或是道德的目的。因此，本研究也從「西藏意識」在市場中如何實踐的追問，凸顯經濟與社會相互鑲嵌的過程。

二、「西藏意識」：離散的認同形構

(一) 政治難民的身分與標籤

「西藏意識」用最簡單的定義是「在流亡處境的藏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被他人看待的方式」(van Driem 2002: 193)。出生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丹青宗智(Tenzin Tsundue)，也是當代知名的詩人，就寫過一首有關「西藏意識」的英文詩，標題就叫做“My Tibetanness”(Tsundue 2000)，在這首詩當中清楚地表現身為難民的狀態：

三十九年的流亡
沒有國家支持我們
沒有任何一個
我們是這裡的難民。
一群失去祖國的人。
不屬於哪個國家的公民。
(...)
我是西藏人，
但我不是來自西藏。
從未到過那裡，
然而我夢見，
死在那裡。⁴

4 中文引自傅正明(2006)的翻譯，“My Tibetanness”在該書中被翻譯為「西藏特色」。

從個人身分上而言是一種無國籍的狀態，從政府的立場，西藏流亡政府也並未被國際各國正式承認，因此這個「西藏意識」是因為流亡而產生的認同形構(diasporic identity configuration, Hess 2009: 49-76)。這個概念被運用在流亡社會發展之西藏國族認同的議題，其中又以想像的西藏國族主義以及流亡政府的角色為重點。由於西藏在1959年被中共解放軍占領，藏人流亡之後，才開始西藏國族主義的建構，而有西藏認同的出現，藏人視流亡為暫時的狀態，有朝一日希望能夠回到西藏，目前所有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西藏自由而努力，也就是藏人所宣稱的「西藏志業」(Tibetan cause, Anand 2000; Houston and Wright 2003; Misra 2003; Giles and Dorjee 2005; Falcone and Wangchuk 2008)，這就是流亡藏人必須承擔的「西藏自由的使命」。

這種具有流離意識的西藏特質有其脈絡。它是受到族群處境所引發的社會行動(Weber 1978: 4)，因此若其特質僅從西藏傳統文化固有性質來描述「西藏特色」，無法適切地表達身分覺知所引發的行動。「西藏意識」的實踐性，就如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提出的「自為的階級意識」(class-for-itself)，是因為認知到自己階級的處境，從而採取維護階級利益的集體行動，流亡藏人也由於認知難民的處境而採取行動。因此，這不只是一種「自在的西藏特色」(Tibetanness-in-itself)，而應該是一種「自為的西藏特色」(Tibetanness-for-itself)，因此選擇「西藏意識」的概念更為貼近實踐的意義。⁵這種「西藏意識」的發展，使得流亡藏人由於意識到自己的難民身分，因而影響自身生存策略的選擇。如一位擁有自己工廠的尼泊爾流亡藏人，同時也是地毯商的Wandu所說的：

我們是難民(……) 西藏難民分散在印度、尼泊爾、瑞士、日本，
我們的法王達賴喇嘛希望，我們不論在哪裡做生意維生，都不要

5 「西藏意識」具有脈絡性，會在不同的情境產生行動，因此不只存在於流亡藏人的處境，也出現在中國西藏境內。例如審查人提到的Adrian Zenz(2013)研究，觀察到中國青海地區的藏人，當面對中國漢化政策，並發現學習漢語能夠有更好的就業優勢條件時，所發展出來的語言學習策略，從中產生一種新型態的西藏特色，來維護西藏文化的行動。由於意識到西藏語言與文化保存的重要性，而產生這個新型態的西藏特色，其實就是「西藏意識」，與本文所強調的行動意義是相應的。

搶當地人的飯碗。例如在瑞士很多人從事林務工，在日本就以佛教繪畫維生，在印度的藏人就賣毛衣。在尼泊爾當地人不用的羊毛，我們就應用在地毯、外套等。如果我開一家茶館，就會造成競爭而傷害到當地人，但利用羊毛就不會。我們基本的目標不是要賺錢，而是維生。(引自Forbes 1989: 41)

這段的引言點出了難民身分對藏人經濟活動的限制，即使藏人流亡到不同的國家安置，由於接待國的社會組成、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而提供不同的經濟機會，都對難民的處境構成影響。

(二) 維繫宗教與文化的使命

流亡藏人除了是難民的身分之外，文化的宗教特色也是其族群重要的特徵，任何與其有關的經濟活動都無法忽視藏傳佛教宗教信仰與經濟活動的關連。最早從宗教文化的選擇性親近(selected affinity)來解釋不同族群團體的經濟特性的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 1958)。他觀察到西方社會由於基督新教改革，宗教的實踐從教會轉移到個別教徒的身上，虔誠的教徒必須透過個人所累積的財富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賺錢的動機來自於宗教信仰，並從而發展出理性計算的簿記制度，宗教的倫理精神引導出資本主義興起，這是宗教影響經濟行動的經典例證。學者接續這個傳統，解釋不同族群團體因為具有不同的宗教與文化，而影響他們的經濟生活，產生不同的表現，例如文化論者指出，具有團結傳統(ethnic solidarity)的族群，成為移民社群之後，較能夠組織集體的資源利用，建立小型事業，因此族群的文化傳統提供了企業經營的親近性(Light 1972; Bonacich and Modell 1980)。

藏人普遍虔信佛教，藏傳佛教構成藏人的文化並深入到藏人的日常生活當中(Samuel 1993)。宗教與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一種是韋伯所呈現的基督新教倫理精神，成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動力，追求財富與禁欲成為資本積累的機制。但是也有另外一類的宗教世界觀認為心靈意義上的滿足超越財富的追求，從而限制營利與資本累積(Wuthnow 1994: 636-637)。為了救渡眾生出離輪迴之苦進而成佛，是藏傳佛教的最高價值，對現世物質的成就不予重視，只是維生的基本工具而已，強調助人利他的倫理，所以

不贊成當代資本主義對私利的追求，認為私欲的滿足必然帶來痛苦，這種世界觀呈現的經濟生活型態在於自給自足而非營利的追求，因此不強調理性計算的態度，千年以來的西藏傳統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流亡的處境中，雖然藏人有機會接觸到外在世界，但因流亡政府擔負著維繫族群認同的民族責任，強調流亡社會保存西藏宗教文化傳統，並提醒藏人身為難民要為西藏自由而努力的神聖使命。因此流亡藏人的佛教倫理觀與西藏自由的使命，對於流亡藏人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從文化和宗教的分析，強調利他與「出世」的宗教價值觀，與資本主義追求個人私利的取向，有本質上的衝突，影響了藏人追求利潤的方式與態度。在流亡的經濟適應過程當中，宗教價值觀和以西藏自由為先的使命，對藏人的企業經營如何產生作用，則需要進入到流亡的處境與產業發展的脈絡進一步觀察。

綜合上述的討論，觀察流亡社會將「西藏意識」從政治認同的面向拓展到市場上的經濟實踐，所必須觀察的內容至少包括(1)藏人如何看待自己難民的身分，以及他人如何對待這些無國籍的流亡藏人；(2)西藏宗教的倫理觀如何對藏人的經濟生活，以及市場經濟的活動產生影響。

三、流亡藏人在印度與尼泊爾的難民經濟

(一) 多點民族誌與比較分析策略

觀察「西藏意識」如何在市場中實踐是本文探討的主題，由於藏人流亡到印度和尼泊爾兩個國家，從1959年的流亡之初至今，歷經60年的發展，本論文的研究個案選取的是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以及在尼泊爾發展的西藏地毯業。這兩個經濟活動都是藏人在流亡之後，分別在當地所發展出來的，在印度流亡藏人的冬季毛衣貿易，主要的市場是印度消費者，雖然只是季節性的經濟活動，卻提供了印度流亡藏人重要的現金來源。而尼泊爾的西藏地毯業，為藏人流亡尼泊爾之後所創立，主要是外銷到歐美國際市場，成為為尼泊爾創造外匯的重要商品，甚至成為該國經

airiti
濟發展的關鍵產業。

選定的這兩個在當代市場經濟體制運作的難民經濟事業，是因為就規模而言，它們都是當地藏人最重要的產業；它們也都觸及藏人與其他族群在市場的互動關係，可以構成難民經濟比較的基準，有助於我們理解「西藏意識」所承載的難民身分和文化使命的重要性，以及為何能夠起關鍵性的作用。由於難民的身分在收容地主國的生存和生計，必然受到當地政府的法規、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影響，因此，以流亡藏人所在人口最多的印度和尼泊爾兩個國家的經濟活動，採取個案比較的研究策略，有助於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關注非自願性的移民生存與生計，特別是「難民」群體，是研究者近年來投入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爾研究的主要議題。從2005到2016年，研究者每一年皆前往印度，利用十到十二月的冬季時間，除了拜訪藏人的定居區之外，同時針對藏人毛衣貿易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以大城市、觀光地或宗教勝地等地區特色，或經營規模型態等性質，選取必須拜訪的毛衣市場。從2011年開始研究範圍擴及尼泊爾的西藏地毯業，主要田野地點是加德滿都(Kathmandu)和博卡拉(Pokhara)。由於研究對象在空間上分布甚廣，且有各種型態的差異，蒐集研究資料的方法採取「多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 Marcus 1995)，田野時間通常每次停留七到十天，對於重要的藏人定居區則會在間隔一段時間之後重複拜訪。毛衣貿易訪談的對象包括流亡政府官員、定居區的代表、不同毛衣市場的毛衣商與毛衣協會的幹部、也包括供應藏人毛衣的印度毛衣製造商。尼泊爾西藏地毯的研究，則分別拜訪藏人定居區的地毯工廠、以及中小型的地毯工作坊等，並對不同經營型態的藏人地毯商進行訪談。這些研究所累積的材料，就是本文分析資料的主要來源。

(二) 在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⁶

藏人販賣毛衣的時間最早可追溯至1960年代，當時藏人還沒有被安置

6 本節有關藏人毛衣產業的描述，摘自潘美玲(2008, 2011)出版之著作。

到各個定居區，主要的生計依靠幫印度政府在印度北部的山區修築道路，當時藏人用自己帶過來的毛線編織出有西藏傳統花色的毛衣，原來是自用或給家人禦寒，不是用來出售營利的商品，但毛衣樣式引起印度人購買的興趣，和當時築路苦力的微薄工資相比，毛衣的獲利甚豐，因此西藏人就開始賣起「西藏毛衣」(Tibetan sweater)補貼家用。但印度和西藏的氣候不同，純正的羊毛織品在印度並不實用，加上手工編織的毛衣產量有限，藏人於是找到印度北方旁遮省(Punjab)的盧迪亞納(Ludhiana)印度人所開設的工廠，批發印度廠商以人造纖維為原料的機器編織的毛衣⁷，從毛衣的生產者變成販售者，雖然販售的毛衣不具有西藏特色，但毛衣市場的展示則具有濃厚的西藏文化特色（詳見本文第四節）。

藏人到盧迪亞納批貨的時間大約是每年的七月下旬，然後將貨運到販售地點所租的倉庫存放，真正賣毛衣的時間是在冬季，從十月初到一月底，然後會在不晚於藏曆新年時再回到定居區。毛衣販售的地點散居在印度大部分的省分與城市，幾乎遍及印度全國各地，有的距離藏人所在的定居區將近數百公里之遙，需要數日的車程才能到達。

雖然藏人在印度的定居區在經濟形態上有農業區與非農業區之別，但毛衣貿易的收入都構成這些定居區的主要經濟來源。印度南部藏人由於分配到耕地，參與農耕的比例較高，根據2004年在南印度的調查，發現毛衣收入佔個別家戶全年收入比例，只有15%的家戶這個比例低於50%，反之，有85%的家戶主要收入來自於季節性的毛衣貿易，其中更有17%的家戶毛衣貿易收入是唯一的家戶收入（潘美玲 2008：47）。但在印度北部和東北部的非農業定居區，若沒有其他的工業或手工業發展，則藏人需要依靠毛衣貿易收入維持生計的比重，比南部的藏人更高。以在喜馬偕爾邦的西姆拉(Shimla)為例，這是一個位居海拔二千多公尺的知名避暑勝地，是英國統治印度時的夏都所在，該地藏人定居社區一共有300多戶，在名為「購物中

7 這些印度毛衣批發商被稱為lala，印度話為企業主，類似我們的中小企業老闆的意思。

心」(The Mall)觀光景點附近的市場有43個家戶設立76個攤位，販賣衣物、皮包等用品，藉著觀光人潮賺取收入，一到冬季冰封道路就不會有遊客和收入來源。夏天擁有店面者只佔整個藏人社區家戶的一成多，其中只有16個家庭因為擁有多家店面有足夠的收入，除了這16個家庭之外，社區其他九成以上的家庭，由於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冬天出外賣毛衣成為唯一的選擇。⁸因此在南部或北部定居區，無論是否從事農業，冬天賣毛衣提供了一個「總比甚麼都沒有好」的機會（潘美玲 2011：18-20）。而研究者2016年到北部拜訪以傳統西藏地毯產業享有盛名的藏人定居區工廠時，也發現因為從地毯產業所得到的薪資過於微薄，不足以維持家戶支出，因此有些工人必須冬季出去賣毛衣賺取現金，導致定居區的地毯工廠在冬季缺工，有時候甚至因此而停頓數月。⁹

從1960年到現在，印度社會經濟有長足的發展，卻沒有影響毛衣貿易對於印度流亡藏人的重要性，最大的改變反而是來自於西藏流亡政府對此產業的態度，從忽視到積極輔導的轉變。已故的社會學者達瓦諾布(Dawa Norbu[1949-2006], 2004: 209)曾感嘆，對此提供印度藏人重要生計的非正式經濟活動，流亡政府卻不予以重視，一直採取不干預且不鼓勵的政策。到了2017年，西藏流亡政府開辦「西藏難民生計扶持計畫」(Tibetan Refugee Livelihood Support Program, TRLSP)，才特別針對毛衣商提供優惠利率的融資與協助，試圖提升流亡社區經濟的發展。根據該計畫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所進行的評估報告，目前約有70%的印度流亡藏人家庭在從事冬季毛衣生意，其中45%家庭的生計與現金收入主要依賴販售毛衣來維持，藏人在印度各地設立的冬季毛衣市場，登記有案者則達183處(Dikshit 2018: 9-11)。¹⁰根據

8 根據作者2009年6月23在Shimla的實地調查。

9 作者於2016年6月拜訪Dehradun藏人定居區地毯工廠的田野資料。

10 毛衣市場遍佈印度各大城市，且市場規模大小不一，流亡政府財政部在2005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有68個毛衣市場協會(DoF 2005: 16)，當時是一個粗略推估的數字，而這份2018年做成的調查報告顯示有183處。對於這兩份資料數字之間的差距，應該是蒐集資料周全性的差異，根據研究者多年田野的經驗，可以確定的是毛衣貿易的重要性依然維持，但是否就此呈現毛衣市場的成長趨勢，則需要更多的佐證資料。

上述的調查報告，冬季毛衣貿易的市場繼續扮演印度藏人經濟主角的地位。

（三）在尼泊爾經營的西藏地毯業

在1959年追隨達賴喇嘛越過喜馬拉雅山流亡的藏人，大部分是到印度尋求政治庇護，同時也有約2000名難民陸續來到尼泊爾¹¹。爲了讓這些難民能夠自給自足，1962年來自瑞士的技術援助機構(Swiss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SATA)提議藏人在加瓦拉基爾(Jawalakhel)的定居區發展手工業和傳統的地毯編織，既可以創造收入，又能夠保持傳統西藏文化的價值。在SATA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的前提下，藏人開始生產西藏傳統樣式的手工打結地毯，賣給來到尼泊爾旅遊的觀光客，以此作爲謀生的手段。當產量和品質漸漸上軌道之後，SATA繼續協助各個定居區設立手工藝中心成立地毯編織工廠，爲了消化這些產品，透過瑞士銀行提供貸款成立出口公司，並逐步將西藏地毯在西方國家打開銷路，也吸引許多歐洲的買主下單，而開始行銷德國、瑞士、美國等國(Frechette 2005: 42)。1970到1980年代的尼泊爾西藏地毯只有在藏人定居區的工廠生產，爲了協助定居區能夠完全自主經營，SATA招募一批年輕人接受語言、技術、管理和商業等教育訓練，這群儲備人才並沒有全部留在定居區，而是利用既有的人力資本優勢成立自己的地毯企業，將西藏地毯的市場進一步拓展(Frechette 2005)。1990年代隨著產量增加以及西藏地毯在歐洲大受歡迎，1995年的西藏地毯生產暴增300%，超過尼泊爾當時的觀光業，成爲賺取最多外匯的商品(O'Neill 1999)。尼泊爾出產的藏毯已經和伊朗的波斯毯、印度的東方地毯齊名。

隨著產業出口的興盛，流亡藏人的手工地毯產業整合進入尼泊爾的國家經濟，藏人私營的地毯工廠，大量雇用尼泊爾工人，採取現代機器經營模式，或將訂單直接外包給尼泊爾人設立中小型工廠。西藏地毯從民俗用品，成爲大量生產的標準化商品，產業越全球化，卻越偏離當初保存西藏傳

11 目前在尼泊爾的藏人已經從當時的2000人成長爲13,514人，這個數字是根據西藏流亡政府2009年針對全世界流亡藏人所作的人口普查(Office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2010: 13)。

airiti

統地毯編織文化的目標。1990年代末期由於尼泊爾人也紛紛加入西藏地毯的產業，導致生產過剩，低價競爭惡性循環，加上童工問題，使該產業訂單銳減。2006年尼泊爾從專制王朝變成共和政體，毛派政權鼓吹工會，更是雪上加霜。但藏人所經營的西藏地毯業並沒有消失，它不是找尋更廉價的勞工，而是轉向手工編織和家庭工作坊的生產方式，強調西藏地毯的文化傳統，而非商品面向，朝向客製化限量的高級成品製作轉型（潘美玲 2012）。

尼泊爾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流亡藏人經營的手工編織西藏地毯產業，曾經在1990年代造就該國第一大產業和出口創匯部門，成為尼泊爾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不同於印度流亡藏人的毛衣貿易小生意，尼泊爾藏人地毯產業的經營者，不但從事大規模的地毯生產，也控制地毯國際貿易的出口市場。位於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視之為流亡社區的企業楷模，¹²希望印度的流亡藏人學習他們的經驗，改善經濟處境。

四、「西藏意識」與經濟實踐

（一）西藏文化與宗教的特色

1. 毛衣市場的族裔地景

藏人聚集賣毛衣的地方被印度人稱為「西藏市場」(Tibetan Market)¹³，根據研究者走訪各地毛衣市場，所觀察到的市場名稱以強調難民身分的「西藏難民市場」(Tibetan Refugee Market)為多，也有以西藏首都命名的「拉薩市場」(Lhasa Market)，或以達賴喇嘛在拉薩時的住所、也是西藏政治中心的所在布達拉宮(Potala)為名，例如在阿桑索爾(Asansol)的西藏市場全名是「西藏難民布達拉市場」(Tibetan Refugee Potala Market)，主要標題

12 流亡政府的經濟部主要刊物Paljor Bulletin從第四期（2006年6月）開始定期刊登流亡社區的成功企業家的經驗分享，推展流亡社區從事企業經營的經驗，其中尼泊爾的地毯商占多數案例。

13 參見The Hindu 2002年11月14日的報導。<http://www.thehindu.com/thehindu/mp/2002/11/14/stories/2002111400010300.htm>，2008/7/3瀏覽。

文字都用英文，有些會加上印度文，以族群與難民身分的特色招攬生意。毛衣市場於是成為藏人在印度各地的族裔地景，例如市場上能看到西藏的五色風馬旗、八吉祥裝飾等傳統圖樣，希望販售毛衣的婦女儘量穿著傳統藏式服裝(chupa)，顯示西藏人的族群特色。雖然所販賣的毛衣或商品不是藏人所製造的，但盧迪亞納的印度製造商會在披肩上印製「百分之百的純西藏披肩」(100% pure Tibet shawls)的字樣以利藏人銷售。雖然類似的毛衣也可以在印度人的店面買到，但藏人強調他們所挑選的毛衣，在樣式、質料、花色的品質較佳，西藏佛教文化的特色，讓印度人相信藏人做生意比較老實，難民的身分更增加了同情的成分（潘美玲 2011：22－23）。

藏人的毛衣市場創造出具有族群特色的整體氛圍，如果是固定式的店面，就會供奉達賴喇嘛的照片，這是藏人商店與當地印度人商店最大的區別，特別是當店面所販售的商品雷同，又雇用印度幫手充當店員時，這就成為一個最明顯的標記。當研究者到藏人毛衣市場進行田野調查時，也會造訪藏人在毛衣市場賃居的住處，為了節省開支，藏人所能找的住處都很簡陋，小小的空間同時充當臥房和庫房，但不管如何地因陋就簡，即使是打地鋪，也都會有一塊個人的宗教角落，上面放置著達賴喇嘛或個人所皈依的上師的照片，或是個人的念珠、轉經輪等隨身的宗教物件。



圖1：藏人在賈坎德邦(Jharkhand)的市場，名為「新拉薩毛衣市場」（作者提供）

這個宗教的角落，就成為藏人冬季必須離「家」遠行數月的心靈依歸，更時時提醒藏人身為佛教徒所必須遵守的「誠實」、「不說謊」、「不貪」的經濟倫理，以及因果業報的觀念。藏人的毛衣市場由於提供流亡藏人一個生存的經濟場域，為了解決同一毛衣市場內成員之間的競爭，以及消弭印度顧客和藏人毛衣商之間因講價而產生的糾紛，故透過成立毛衣協會，集體協商訂立不二價的策略。並更進一步發展出市場利潤平均化的措施，例如，定期輪換市場攤商的位置，讓市場成員都有同樣在熱門地點做生意的獲利機會，甚至也對生意較好的攤位進行進貨配額管制，以照顧同一市場中當季業績落後的攤位有出清的機會（潘美玲 2011: 45）。這些從藏人毛衣市場所發展出來的「道德經濟」實踐，提供藏人解決宗教信仰和經濟活動矛盾的出路，達到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藏人提出的誠實無欺的要求，形成族群的良善形象，並表現為集體經濟行動的「公平」和「誠實」原則。

2. 西藏地毯的文化正統性

藏人在尼泊爾創立西藏地毯產業的初衷，是希望能夠維持生計並同時保存傳統文化。消費者的市場一直都是驅動西藏地毯業的動力，來自歐美國家的訂單，支持了藏人定居的經濟，協助難民自立自強，也從中培育了寶貴的人才(Forbes 1989; Frechette 2005)。經濟的邏輯支配整個藏毯產業的發展，讓西藏地毯的生產從民俗用品變成標準化生產的商品，導致價格競爭的惡性循環，從而使其在歐美的市場遭到挫敗，被迫尋求新的市場利基，並轉向中國市場。

(1) 歐美出口市場往高價的客製化生產發展：放棄過去大量生產的標準化尺寸和圖樣，強調純手工編織的特色，如「來自於喜馬拉雅的手工編織地毯」(hand-knotted carpets from the Himalaya)與「正宗」的產品，主打以西藏或紐西蘭進口的羊毛為原料，天然的礦物或植物染料，對環境友善的處理過程，更重要的是，絕對不使用童工的原則。然而，到底什麼條件是「正統的西藏地毯」所不能被取代的部分？如果是來自於西方市場的客製化訂單，圖樣由顧客選定的現代樣式，又由尼泊爾的工人編織完成，如

何宣稱這是西藏地毯？從事藏毯生意二十多年的卡桑(Kalsang)，毫不猶豫地解答我的疑惑：「很簡單，只要是使用西藏編結的方法，就是西藏地毯」¹⁴，也就是編織地毯最基本的分類判準。除了提供好的產品之外，藏人地毯商更特別表明自己流亡難民的身分，取得歐美客戶對產品的道德認同，建立長期的信任關係，得以排除來自於尼泊爾人價格惡性競爭的困境。

(2) 積極開拓中國的市場：西藏地毯是藏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必需品，羊毛手工編織的地毯適合高寒氣候的青康藏高原，用作例如馬鞍、各種尺寸的坐墊、床墊，甚至裝飾品等，一般住家和佛寺都有需求，傳統的地毯編織在西藏屬於民俗技藝的家戶手工藝，並沒有大規模的生產。而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地毯生產，被共產黨認定為四舊，在文革時期是廢除的對象，也一直沒有產業化的發展。直到尼泊爾西藏地毯業的成功，1972年後中共才開始認知西藏地毯的價值，允許成立藏毯企業。由於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收藏傳統的西藏地毯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¹⁵但在中國生產的藏毯，是以社會主義式的國家經營，機器大量生產的方式，而個體戶所經營的地毯產業則規模太小，在技術、設計、品質等層面都無法生產出收藏等級的地毯(Zhang 2009)。反而在尼泊爾的西藏地毯生產，滿足了中國市場對品質、數量和價格的需求，從西藏境內出來看貨的人日漸增多，又迎合這個新興市場的需求，原來主做歐美市場的尼泊爾的藏人地毯商，開始生產傳統西藏圖案的地毯，等待買主上門選購。

這種生意是透過中間商選貨進行的，研究者在尼泊爾田野調查期間，就觀察到從西藏過來的看貨者，利用手機拍照將選定的幾個地毯成品樣式，直接傳給有意購買的買主，徵詢下單意願，並負責議價。這種經營型態和歐美市場先有訂單再下料生產的客製化買賣不同，因為需要事先生產各種產品讓顧客當場選購，增加資金和庫存的壓力。然而，流亡藏人在尼泊爾生產的西藏地毯往中國市場的開拓，表示在藏毯的生產上，取得了正

14 2011年11月3日訪談，地點加德滿都，Kalsang（化名）的工廠（在住家裡面）。

15 這種成為收藏品的時尚，某種程度應該有受到西方人的價值觀影響，將西藏地毯認定為未受工業文明污染的傳統工藝(Zhang 2009: 35)。

宗的地位，同時也因為中國市場的需求，使尼泊爾的藏毯重新講求具有文化意義的傳統編織圖樣。

(3) 定居區的藏毯工廠則完全放棄出口市場，以觀光工廠的方式，讓觀光客可以實地參觀整個藏毯製作的流程，並直接採購在展示間的成品，根據研究者的田野觀察，這些觀光客有些是整團由觀光巴士帶來，也有計程車帶來的散客。由於提供眼見為憑的難民手工製作的正宗地毯，相對合理的價位，並提供貨運服務，讓來訪的觀光客不必受地毯體積和重量的限制，都能買到滿意的產品。由於藏人的定居區和地毯工廠被《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等知名的旅遊書納入尼泊爾的觀光景點之列，他們成為觀光客在加德滿都的必到之處。如此宣傳，提供了定居區藏毯工廠的客源，也維持工廠繼續營運的條件。



圖2：藏人定居區的藏毯工廠（作者提供）

以上三種策略朝向與尼泊爾的廠商進行區隔，爭取不同型態的客源，包括歐美高端的客戶，中國境內西藏的買家，以及來到尼泊爾的觀光客。而所採取策略的共同點，在於完全放棄以低價競爭的出口市場，轉而強調傳統的西藏地毯生產，也就是以西藏進口的羊毛為原料，天然的植物染料，傳統西藏文化或佛教的圖像，對環境友善的製作流程等因素，同時除

除了中國市場以外，強調難民親手製作，以強化其正宗性。尼泊爾西藏地毯產業歷經市場轉型之後，峰迴路轉地走向當初發展藏毯事業時，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初衷。

（二）西藏志業

1. 做生意不忘西藏自由

藏人所販售的毛衣，雖然是由印度人所生產製造的，但是每一件毛衣的標籤上，除了貨物型號和價格的標示在背面之外，都在正面印有該毛衣市場的名稱地點，襯上西藏國旗或西藏地圖，並加上「拯救西藏為世界和平」(Save Tibet for World Peace)或「讓西藏自由」(Free Tibet)等英文，或者強調印度和西藏兩國人民的友誼（如圖3所示）。利用每一件出售的商品，讓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象徵——「雪山獅子旗」——傳播給各地的消費者，也彰顯藏人的難民處境，告知世人西藏被中共佔領的現況，提醒流亡藏人共同為西藏自由所奮鬥的志業。



圖3：藏人販售毛衣的標籤內容（作者提供）

藏人毛衣商和印度毛衣製造商成立的「印藏織品協會」(Indo-Tibetan Hosiery Association)主要的功能是與印度的地方政府進行協商。所有與毛衣

貿易相關的事務與政策，都透過這個組織管道進行溝通，例如市場地點的租借等。藏人也透過這個協會，連結印度毛衣製造商對西藏志業的支持，共同參與自由西藏(Free Tibet)的遊行，或贊助有關藏人事務的活動，透過生意的關係，建立西藏志業的支援網絡，實現「印藏友誼」(Indo-Tibetan Friendship) (潘美玲 2008: 53-54)。

相對於在西藏毛衣上可以自由地附上雪山獅子旗和為自由西藏宣傳的標籤圖示，在尼泊爾生產的西藏地毯並沒有特別附加這些標示，主要的原因是西藏地毯商品本身就具有文化特色，這是藏人在印度販售的西藏毛衣所缺乏的優勢。加上後來毛派執政之後，強烈的傾中立場，採取更嚴厲地打壓藏人自由西藏的活動，從而限制了商品上公開標示西藏自由等政治符號的作為。受限於尼泊爾政府的政策，尼泊爾的西藏地毯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包括中國），並不會有自由西藏的標籤，但如前一節所強調的「西藏意識」實踐，重點在於藏毯生產從標準化的大量生產回歸到保存傳統文化的意義。

2. 佛教倫理與財富正當性

由於西藏地毯產業的發展，造就了一批成功的藏毯企業家，這些人因為西藏的難民身分而獲得外國援助組織的協助，培養語言和管理能力，提供創業的資源，而擁有從事跨國貿易能力，進而發財致富，並且因為其難民身分而能持續維持與國外買主的關係(Frechette 2005; O'Neill 2005: 279)。這些企業家與尼國之前的王室政府關係良好，從而取得當地公民的身分，生意上雇用尼泊爾工人，或外包給尼泊爾的中小型工廠。

即令如此，藏人地毯企業家還是很明確地認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流亡藏人的身分，並沒有因為擁有尼泊爾公民身分而不實踐西藏志業。他們相當積極地出錢出力：例如參與西藏青年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的活動，或擔任西藏婦女協會(Tibetan Women Association)的重要幹部。但他們同樣受到難民標籤的影響：首先，這些人成功致富，因為難民身分而被質疑其「財富的正當性」。一方面流亡藏人內部質疑其對賺錢興趣高過於對西藏的忠誠；和那些放棄高薪而從事服務藏人工作者比較，或是與比較高的工資優先雇用藏人的定居區工廠老闆相比較，這些企業家並沒有為西藏

airiti

奉獻的表現。另一方面的不滿則來自尼泊爾當地人，尤其在這個貧窮的國度，難民身分和榮華富貴的生活顯得格外刺眼。因此，這些資本家必須有實際的作為，展現其對藏人社群甚至是尼泊爾社會的道德責任，同時也必須持續地在獲利致富和難民宿命的兩種價值觀之間，發展出「難民財富」的正當性論述。

對於信仰佛教的藏人，又是流亡難民的這些企業家而言，雖然因為藏毯生意獲取利益，又必須維持佛教徒「不貪」的經濟倫理，他們對「西藏志業」的投入，除了表現在個人對西藏前途休戚與共的行動之外，也為其財富積累提供正當性的基礎，也就是說，財富積累的目的，是為西藏志業的成功。宗教倫理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在西方的新教徒革命，清教徒以世間財富的成就，證明自己是上帝選民的關係，佛教經濟倫理在此扮演了超越性價值的角色，促使即使已經具有尼泊爾公民身分的藏毯企業家，透過西藏志業的積極投入，來證明其事業成功的正當性。

然而，當尼泊爾共產黨掌權之後，採取積極親中的路線，對於當地流亡藏人採取緊縮政策，任何公開支持西藏自由的活動都被視為犯罪行為，警察有權逮捕參與活動成員，包括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活動也被禁止 (Human Rights Watch 2014: 46-56)。也就是說，在尼泊爾從事西藏志業，是當地政府所不容許，這對於已經具有身分地位的藏毯企業家而言，更是高風險的行動。研究者在2011年的田野民族誌，記錄了這類行動的危險性：

這是我首次造訪加德滿都的藏毯企業家，剛好遇到藏人社群正為紀念當時在西藏境內自焚的同胞，在定居區的社區廣場舉行悼念儀式，並將達賴喇嘛的大型照片，垂掛在社區外牆，幾乎當地的所有藏人，包括佛寺的僧侶都出席這次的活動，許多藏毯商也在其中。我剛認識的藏人朋友諾布(Norbu) (化名) 是一位成功的藏毯商，負責活動的後勤，提供物質以及協助傷者送醫的角色。這一次，再加上帶著我這位昨天才從臺灣來的學者參與這個活動，他負擔起保護我的安全的任務。活動的前一天，他和一些藏人朋友就帶著我，事先勘查場地路線，以及之後的集合地點，當時的我並不清楚，這種追悼集會為何需要一個傷者後送的角色，以及事先路線勘查與確認集合地點。

紀念活動一大早舉行，才開始沒多久，社區廣場就被帶著棍棒的尼泊爾警察層層包圍，警察上前強制拆除達賴喇嘛的照片，隨即

引發藏人的不滿，警察於是開始驅離人群，藏人紛紛湧到街上遊行抗議，最後和警察在附近一處公園對峙。我則在諾布的引領下，從社區圍牆的縫隙翻出去，擺脫警察的包圍，隨後到街上瞭解遊行狀況，並到了雙方對峙的公園，我很小心地保持距離並伺機拍照。我顧著關注前方混亂的情況，忽然間，發現應該保護我，諾布不在身邊，回頭一望，原來他被警察逮捕上了囚車，有這些人不斷地和警方拉扯，也有些人被警棍所傷，此時我才明瞭為何需要一位後送傷患的人員，只是這次諾布也被捕了。我望著站在囚車上面的諾布，他和我交換了一下眼神。於是，我循著昨天他們帶我走過的路線，獨自走回到集合地點和其他人會合，並帶回諾布被捕的消息。當天下午，我將當時所拍攝到的照片拷貝一份，交給當地的藏人記者。

諾布和那些被從公園抬出來的藏人一起被送進監獄，這是他第一次被關進監牢，經過了十個多小時之後和其他人獲釋回家。他表示當時是看到一位和警察拉扯的藏人婦女的鞋子掉了，不加思索地過去幫她撿起來，卻在當下被警察逮捕。還好，因為和許多人一起關著，他的身分就沒有特別引發注意，因此沒有讓他留下「不良」的紀錄。諾布告訴我，他沒料到這次會被逮捕，但即使重來一遍，他還是會做同樣的事參加西藏志業的活動和遊行，雖然有被捕的風險，但西藏志業是流亡藏人共同的責任，他不會置身事外的。



圖4：被尼泊爾警察抓到囚車的藏人抗議者（作者提供）

五、結論

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雖然毛衣製品是由印度毛衣製造商生產製造，藏人則從事批發零售，並將整個毛衣市場，從名稱、符號、標誌等，呈現出西藏文化宗教的風貌，營造出「西藏市場」的族裔地景風貌。而在毛衣市場當中，制訂「不二價」的價格策略，以及爲了族群團結而採取「利潤平均化」的設計，則是立基於佛教的經濟觀，以及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藏人誠實無欺的良善形象的要求，雖然販售的產品相當類似，卻能避免同族群毛衣販售者之間的惡性價格競爭（潘美玲 2011）。至於「西藏志業」的部分，在每一張毛衣織品的標籤上印製西藏國旗，透過商品的銷售將西藏的處境傳播到廣大的印度社會當中。藏人毛衣商也透過與印度毛衣製造商長期的生意往來（潘美玲 2017），建立深厚的跨族群情誼，爭取印度毛衣製造商的參與，延伸了「西藏志業」的網絡。

尼泊爾的藏毯事業創立的初衷，是幫助難民自給自足，同時延續傳統文化的工藝。然而消費市場的力量，驅使西藏地毯的商品化，更吸引了尼泊爾人大量進入該市場，造成過度擴張與惡性競爭，流亡藏人的藏毯生產於是重新返回到西藏傳統文化的表現，靠著過去累積的產業知識，不但進軍中國藏毯市場，也奠定尼泊爾生產藏毯的正統性地位，而強化了「西藏意識」當中有關西藏文化特色在藏毯生產的表現。尼泊爾的藏毯產業，造就了一批成功的藏毯企業家，雖然他們都具有尼泊爾公民的身分，也雇用尼泊爾當地的勞工，並且也因為藏毯事業累積了相當的財富，他們卻還是無法自外於流亡西藏的處境，以及佛教倫理觀的影響，因而積極地投入西藏志業的相關活動，義務擔任相關組織的重要角色，既出錢又出力。對於藏毯企業家而言，西藏志業的行動，能夠提供他們身爲流亡藏人的一員，且是堅信的佛教徒，卻在事業上面獲取可觀利潤並累積財富的正當性。

由於印度和尼泊爾兩個國家在收容流亡藏人的政策上有所差異，印度毛衣商在實踐西藏志業的過程中，有自由發揮的空間，特別是在西藏毛衣貿易的市場當中，可以利用文宣裝置來傳達西藏自由的理念，提醒世

airiti

人西藏的處境，並不會造成公共安全的疑慮（如針對來訪的中國官員當面抗議等舉動）；只要是和平的舉動，藏人就可以在市場中公開大聲地進行與宣揚。然而，藏人在尼泊爾的待遇和印度完全不同。自從毛派政府掌權之後，任何宣揚西藏自由的活動皆為官方所禁止，而任何「反中」活動就是犯罪行爲。因此尼泊爾的藏人，實踐西藏志業就必須和當地政府進行對抗，甚至因此觸法而被逮捕。但事業成功的藏毯企業家，參與這些高風險的行動，表面上看似乎會威脅到他們在尼泊爾經營的事業，但從他們的難民身分和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則有助於他們對同族群的藏人證明其累積財富的合理性。

流亡社會也存在著傳統的西藏行業如西藏食品、藏香製作、傳統服裝、宗教器物等，它們是傳統文化的延續與保存，其生產的勞動力以及主要的消費者是藏人的社群。「西藏意識」在這類的市場，是買賣兩方的共識，也有行動的意義與難民經濟的特色，只是人口的限制，這類產品市場規模都不大。但是本文所討論的案例結果，也同樣可以推及族群內的生產和消費的經濟活動。

透過「西藏意識」在流亡藏人產業的實踐過程以及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見，在市場實踐西藏意識的過程中，藏人如何利用難民標籤以及「西藏志業」的道德認同，成就其難民經濟，從而印證了博蘭尼所主張的經濟活動不完全只受到自我利益極大化的動機所主導，而是鑲嵌在社會性動機的觀察。尤其流亡藏人社會的發展要務，在於「為西藏的家園尋求正義，並以實踐文化和傳統來保存認同與語言」，因此經濟的目的在於維生，在於推動西藏志業，從而在市場運作範疇，對於資本主義式的財富積累和壟斷式的擴張，產生了節制的力量。在毛衣貿易所發展的道德經濟，以及西藏地毯商也必須承擔西藏志業所帶來的風險，兩者都是努力維繫藏人在流亡處境下族群團結的基礎。佛教「不貪」的倫理觀，以及因果業報的理論，讓西藏意識不只在政治領域，也在市場中實踐，甚至有所體現(embodiment)。對於那些成功的企業家而言，西藏意識的實踐，即使有風險，從佛教的經濟倫理觀來看，其實是相當理性的行爲。西藏意識在流亡藏人的難民經濟中實踐，成為驅使著所有流亡藏人能夠一起奮鬥的動力。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傅正明(Fu, Zheng Ming)。2006。《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人的詩情》*Shi cong xueyu lai: xizang liuwang shiren de shiqing* [Poetry from Tibet: The Passion of Exiled Tibetan Poets]。台北(Taipei)：允晨文化(Yunchen wenhua) [Asian Culture]。
- 潘美玲(Pan, Mei-Lin)。2008。〈既非對抗亦非屈服：印度流亡藏人的在地生存策略〉“Ji fei duikang yi fei qufu: yindu liuwang zangren de zaidi shengcun celve” [Neither Confronting nor Submitted: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Exiled Tibetans in India]，收錄於《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下冊）》*Kuajie liuli: quanqubhua xia de yimin yu yigong (II)* [Transborder and Diaspora: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under Globalization II]。夏曉鵬、陳信行、黃德北主編(edited by Hsiao-Chuan Hsia, Hsin-Hsing Chen, Te-Pei Huang)，頁37-59。臺北(Taipei)：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 。2011。〈流離的道德經濟：流亡印度的藏人毛衣市場與協會〉“Liuli de daode jingji: liuwang yindu de zangren maoyi shichang yu xiehui” [A Displaced Moral Economy: Tibetan Refugee Sweater Markets and Association in India]，〈臺灣社會學刊〉*Taiwan shehuixue k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46: 1-55
- 。2012。〈國家、市場與文化：尼泊爾西藏地毯業〉“Guojia, shichang yu wenhua: niboer xizang ditanye” [State, Market and Culture: Tibetan Carpet Industry in Nepal]，發表於「2012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fabiao yu* “2012 nian Taiwan shehuixue nianhui ji guokchui zhuanti yanjiu chengguo fabiaohui” [paper presented in “2012 Taiw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n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Granted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Presentation”]，臺灣社會學會與國科會主辦(Taiwan shehui xuehui yu guokchui zhuban) [Organized by Taiw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2012/11/24-25。
- 。2017。〈印度流亡藏人毛衣貿易的跨族群經濟〉“Yindu liuwang zangren maoyi maoyi de kuazuqun jingji” [The Cross-Ethnic Economy of Exiled Tibetan Sweater-selling Business in India]，發表於「2017年西藏文化藝術節——國際西藏學術研討會」*fabiao yu* “2017 nian xizang wenhua yishujie—guoji xizang xueshu yantaohui” [paper presented in “2017 Tibetan Culture and Art Festival—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Tibetan Studies”]，文化部主辦(Wenhuabu zhu ban) [organized by Ministry of Culture]，2017/11/11-12。

二、英文書目

- Anand, Dibyesh. 2000. "(Re)imagining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of South Asia," i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9(3): 271-287.
- Banacich, Enda and J. Modell. 1981. *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 a Study of Japanese Americ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nstorff, Dagmar and Hubertus von Welck eds. 2004(2003). *Exile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Private Limited.
-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2003.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III,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2003-2006*. Dharamsala: Planning Commission, CTA.
- Department of Finance (DoF). 2005. "Tibetan Sweater Sellers." *Paljor Bulletin* 1: 16-17.
- Dikshit, Mona. 2018. *A Microfinance Success Story of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Tibetan Refugee Livelihood Support Programme of SARD, CTA 2017*. Hyderabad: Institute of Livelihood Research and Training, BASIX.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IPOwuCLVZOUmg1bEl2dUdyVTRWaWpWVEhJb1d1eU9DcnVr/view ° (Accessed 2018/8/31)
- Falcone, Jessica and Tsering Wangchuk. 2008. "'We're Not Home':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India Review* 7(3): 164-199.
- Forbes, Armbrrecht Ann. 1989. *Settlements of Hope: An Account of Tibetan Refugees in Nepal*. Cambridge, MA: Cultural Survival.
- Frechette, Ann. 2005. *Tibetans in Nepal: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mong a Community in Exile*. Oxford: Berghahn Books.
- Gilesa, Howard and Tenzin Dorjee. 2005. "Cultural Identity in Tibetan Diasporas," 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6(2): 138-157.
- Hess, Julia Meredith. 2009. *Immigrant Ambassadors: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Houston, Serin and Richard Wright. 2003. "Making and Remaking Tibetan Diasporic Identities," in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4(2): 217-232.
- Human Rights Watch. 2014. *Under China's Shadow: Mistreatment of Tibetans in Nepal*.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Light, Ivan. 1972.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Mahmoudi, Kooros M. 1992. "Refugee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Tibetans in Ind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6:17-32.
- Malkki, Liisa H. 1994. "Citizens of Humanity: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Nations," i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3(1): 41-68.
- Marcus, George E. 199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1): 95-117.
- Misra, Amalendu. 2003. "A Nation in Exile: Tibetan Diaspora and the Dynamics of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1," in *Asian Ethnicity* 4(2): 189-206.
- Norbu, Dawa. 2004. "The Settlements: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xile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edited by Dagmar Bernstorff and Hubertus von Welck, pp.186-212.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Private Limited.
- Office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2010. *Demographic Survey of Tibetan in Exile-2009*. Dharamsal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chen Kyishong.
- O'Neill, Tom. 1999. "The Lives of The Tibeto-Nepales Carpet," in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4(9): 21-38.
- . 2005. "Ethnic Identity and Instrumentality in Tibeto-Nepalese Carpet Production" *Asian Studies Review* 29: 275-286.
- Samuel, Geoffrey. 1993.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Tibet Justice Center. 2011. *Tibet's Stateless Nationals II: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Oakland, CA.: Tibet Justice Center.
- Tundue, Tenzin. 2000. *Crossing the Border*. Mumbai, India: University of Mumbai.
-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10. *Convention and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http://www.unhcr.org/3b66c2aa10>. (Accessed 2013/05/10)
- . 2017.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2016*. <http://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Accessed 2017/08/30)
- . 2018, *Figures at a Glance*. <http://www.unhcr.org/figures-at-a-glance.html>. (Accessed 2018/07/24)
- van Driem, George. 2002. "What Defines Tibetan-ness?" in *The Tibet Journal* 27(3-4): 191-195.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uthnow, Robert. 1994. "Religion and Economic Life,"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 J. Smlser and R. Swedberg, pp. 620-64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Zenz, Adrian. 2013. *'Tibetanness' Under Threat? Neo-Integrationism, Minority Education and Career Strategies in Qinghai, P.R. China*. UK: Global Oriental.

Zhang, Tracy, 2009. *Carpet Worlds: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ibetan Carpet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